

北伐前黄埔军校与第一军的党军体制

——以国共关系的演变为视角

李翔

内容提要 黄埔军校引入党军体制之初,国民党一面联俄容共,一面在内政外交上采取防范措施。孙中山离世,国民党失去公认领袖,军权和意识形态都缺少了驾驭的舵手,这对党军体制的走势影响甚大。汪精卫继任总党代表,允许共产主义思想在军校与第一军流传。中共党人主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国民党人掌控的孙文主义学会相继成立,意识形态纷争遂由个人行为演变为集体行为。为掌控军权与政权,管控意识形态,蒋介石挑起三二〇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排挤中共党人。蒋军权固然稳定了下来,但第一军党军体制大受影响,战斗力迅即下降。蒋依托军校与第一军的军力,成了国民党政权合法的也是事实上的中心,以党领军的建军目标,朝着以军控党的方向调头而去。

关键词 党军体制 黄埔军校 第一军 意识形态 国共关系

李翔,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510520

党军体制是国民党以俄为师,在军队建设上推行党治理念,力图使军队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相互促进的制度体系。1924年,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以校建军。军校率先引入党代表制、政治部制和特别党部制,军事与政治工作并重。1924年11月30日,军校教导团采用党代表制^[1],党军体制轮廓初具。黄埔军校及由教导团发展而来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一度是贯彻党军体制的有力单位。

党军体制关联面甚多,长期引起海内外学界的研究兴趣。体制的演替,不仅涉及国内方方面面,也兼及国际局势的变动。自1924年10月俄械运抵黄埔至1926年三二〇事件,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大量进入军校和第一军党军系统,或担任党代表,或主持政治部,或任职特别党部,大大推动体制的发展。但是,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和纷争,使体制在发展中潜伏着诸多变量。本文以国共关系为切入点,着重考析北伐前黄埔军校与第一军从规划中的“以党领军”到现实中的“以军控党”的转向经过,借此加深对这一时段党军体制和国共关系的认知。

本文为笔者主持的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国民党军队‘党军体制’演变研究(1924-1928)”(15FZS017)阶段性成果。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268页。

一、中共党人成为党军体制的主要实践者

国内学界多认为,孙中山晚年政治上的转变得益于苏俄和中共的帮助,其与中共的合作诚心诚意。但是,从1924年黄埔军校创建之初中共职员数量、战斗部队对中共党人的排斥等处,更能体会出国民党一边让出部分职位,一边对中共党人进入军事部门的高度防范心理。这种心理直到这年10月俄械运抵黄埔,才为之改观。

黄埔军校早期引进的中共党人不仅数量少,党内地位不够高,且集中在党军系统,而非军事指挥人员。1924年6月12日,张申府被任命为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在蒋介石提名的17位军校高层职员中,只有张是中共党员。张未受过军事训练,书生气重^[1],不是中共核心党员,对国民党人的军权构不成潜在威胁。6月15日,蒋任命的4位学生总队队长中,茅延楨、金佛庄为中共党员。7月3日成立的军校特别区党部的5名委员中,有李之龙、金佛庄、严凤仪3位共产党人^[2]。这些有限的中共党人,常以秘密身份为党服务,任职初期多未暴露身份。

黄埔军校是在苏俄援助下建立起来的,不接受一定数量的中共党人难以向苏俄顾问交待。但广东革命政府以建国军命名的各类部队,初期并未享有苏俄援助,对苏俄顾问和中共党人极其排斥。驻华大使加拉罕为此在俄共政治局会议上抱怨:“我们去广州做工作,我们派去了工作人员,广州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在那里什么事情也不能做。那里有孙,有党,但不让我们到任何一个部队中去。当时我们为了争取让我们下军队,整整一年都碰钉子。在那里我们从何处着手呢?”^[3]

对中共向国民党军队渗透的担心,是国民党容共初期,排斥中共党人进入军事部门的重要因素。这既说明国民党的警惕心理,也反映了苏俄此时的援助力度不够,没能让国民党提供更多的职位。双方的合作,从开头就充满着相互的审视、戒备和利益交换,这也预示着未来的国共关系有太多的不可测因素。1924年10月8日,第一批俄械秘密运抵黄埔^[4],鲍罗廷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军校师生兴高采烈地搬运武器,不再为今后的革命而发愁^[5]。国民党获得了奉为至宝的武装,军力的大增指日可待。孙中山对鲍罗廷的信任危机就此止住,这对未来中共党人批量进入黄埔军校及其教导团的党军系统,大有帮助。

政治永远遵循按实力说话的原则。俄械到来,既让鲍罗廷对国民党的影响大为增强,又令官场风向为之一变^[6]。不仅在孙中山蒋介石的眼里,而且在多位军事将领的眼中,苏俄顾问已成为“摇钱树”和升官“发动机”。苏俄顾问既然可供军事将领利用,军事将领又何尝不可为苏俄顾问所用?一方需要俄械和卢布;另一方需要军事将领拿出职位,以待中共党人。直接让中共党人掌控军事指挥权,几乎等于要军事将领的命,这些人把军队看作自己的私人财产^[7]。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党军系统及其政治工作入手,既与苏俄革命成功的经验相吻合,又不至于让军事将领一口回绝,双方均有回旋的余地。

苏俄规劝国民党注重军队政治工作,加强党军体制建设。这既是针对国民党军事斗争屡次败北

[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105页。

[2]《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03、211页。

[3]《加拉罕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1日于北京),《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1页。

[5]王柏龄:《黄埔开创之回忆》,1938年12月重庆,1988年6月再版,出版社不详,第55-56页。

[6]邓演达:《致张难先信》(1924年12月24日),梅日新:《邓演达文集新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1页。

[7]《张发奎口述自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而开列的药方,也含有利用党军系统及其政治工作,以中共党人为主力,改造掌控国民党军队的用意。苏俄红军能够通过政治工作及统一的思想信仰,实现以党领军、以文驭武。对中共比较警惕的国民党,虽意识到了政治工作的必要性,但在什么前提下,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实施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监控军权的党军体制?国民党意识形态一向不够紧密,国共合作,会不会使现有意识形态因外来思想的竞争而更加松散?视军队如私产的军事将领,能够心甘情愿地听从中共党籍的政工人员的牵制吗?

俄械到来后,孙蒋这一时段接纳较多的中共党人进入党军系统,一是苏俄施压,二也希望借此为弊端丛生的国民党提供新的血液,三是欲化中共之力,为己之力,以便做两党的“盟主”^[1]。越到1924年底,孙越对一些国民党人表露出不满意,转而越是欣赏中共党人的做事风格。“十三年来,民国绝无起色,党务并不进步,皆由尔等不肯奋斗之过。彼共产党成立未久,已有青年同志二百万人,可见其奋斗之成绩。尔等自不奋斗而妒他人之奋斗,殊属可耻。”^[2]中共积极进取,还表现在其党员愿意做国民党人轻视的事务,军队政治工作就是国民党人比较看淡的行业之一,这为中共党人进入党军系统提供了难逢的机遇。

国民党虽已开启党军体制,但关键的问题是政治训练的内容和由谁来提供这种训练。“在广东,找不到有经验的、俄国人认为能够完成政治灌输任务的合格的宣传人员,也没有多少中国人对这项工作感兴趣。这是一项新的、非传统性的工作,况且从事这种工作又能得到什么报答呢?因此,申请从事政治宣传工作的人寥寥无几,当鲍罗廷把空缺的位置留给主要是从中国共产党中选出来的专门干部和中国工会运动最激进的参加者时,也很少有人抱怨。”^[3]但鲍罗廷是政治总顾问,对军中事务并不熟悉,也少有精力指导军事。要使军校和教导团的党军体制进入正轨,还需要有威望的军事顾问的努力。1924年10月底,继苏俄输入大批军火和物资之后,一批有声望的军事人员应孙邀请抵达广州^[4],为首的就是赫赫有名的加伦将军。随着加伦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军事人才的到来,政治工作放任自流的局面结束了。

苏俄提供大批的军火后,其顾问的话语权有了明显改善。既然许多国民党人不愿意进入党军系统从事政治工作,不虚位以待中共党人,国民党于情于理也无法说通。军校政治部主任邵元冲因要陪同孙中山北上,经过廖仲恺、蒋介石和军事总顾问加伦会商,决定请中共推荐人选担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担任该职^[5]。年轻的中共党人周恩来出任军校党军系统主要部门政治部的负责人,说明国民党对中共的戒备之心有所减弱。周出任政治部主任之职,是继加伦抵达广州后,党军体制建设迎来的第二个利好消息。辩证地看,这也使党军体制深深地卷入国共关系之中,体制的未来命运受制于国共之间的亲疏。

[1]孙中山和蒋介石起初都欲做两党“盟主”。三二〇事件后,“蒋介石此时的思想作风,还是认为国共联合战线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但他的国共合作的新方案,不是采取联合的方式,而是采取统治的方式。他向国民党中央提出的整理党务方案最初的内容是:把国民党与共产党置于他或他的代理人国民党中央主席的隶属之下。他的思想是不管三民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只要服从他,为他所用,他都兼容并收。换句话说,他不仅要管国民党,还要管共产党,至少限度他要把参加国民党工作的共产党员都要管起来,由他一手包办。”见《包惠僧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页。

[2]孙中山:《与石克士等的谈话》(1924年11月21日),据北京《顺天时报》,1924年12月2日,《中山到沪与共产党之活动》。

[3]〔美〕雅各布斯:《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殷置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5页。

[4]1923年底,鲍罗廷在广州只有5名军事顾问。1924年6月,顾问增至25人,包括军事、文职顾问以及辅助人员。1926年1月达到47人,同年春季为58人。《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第147页。

[5]《包惠僧回忆录》,第152页。

孙中山1924年底北上,有联络北方军阀张作霖和段祺瑞,以谋大位的初衷^[1]。一旦孙与张段妥协,不仅联俄容共的路线遭致危机,黄埔军校的重要地位也会大打折扣,蒋以军校护党救国的革命使命和个人抱负也会随之失去。幸运的是,段祺瑞的倒行逆施最终摧毁了孙段张的三角联盟,阻止了党内妥协倾向,多数国民党人觉得非继续联俄容共不可。孙段张三角联盟解体,表明国民党要拯救中国,只剩下武力统一这一条路可走。要北伐,就要特别借重苏俄援助,就要有劲旅,这尤其取决于军校教导团的军事发展。而要提升军力,蒋一要依靠苏俄顾问,二要依托中共党人。在蒋的心目中,政治总顾问鲍罗廷和军事总顾问加伦决定着俄援的分配,奇货可居,自然有着特殊地位^[2]。年轻又有活力、敢于任事的中共党人,进入党军系统开展政治工作,可以推动军校和教导团的建设,特别是增强教导团的战斗力,因而也是可以借重的一支生力军。在蒋看来,只要控制住军事指挥权,就能对中共防患于未然。

1924年底,苏俄用异常丰厚的军火和金钱,换来了国民党让出党军系统的大量职位。国民党不少军事单位由苏俄援建而成,它们或者是新型军种,或者是部队生力军,对革命政府未来的命运极其重要。其中包括黄埔军校及其教导团、孙中山卫队、铁甲车队、航校和空军、海军等。可以说,国民党把苏俄援建的所有军事部门,反过来都向苏俄和中共敞开了怀抱。中共建党晚,在南北各地旧军校中发展的军人员人数有限,初期主要精力投在了城市工运。几次大罢工的挫折,使中共认识到赤手空拳不足以和军阀进行斗争。不难想象,黄埔军校和教导团对于中共有多么重要。就现实讲,它为中共提供了从事军事运动的最佳实验场所。放眼未来,在苏俄支持下,它完全有可能为中共将民族民主革命转向社会革命,储备充足的军事资源。但是,蒋接纳中共的原则是,中共党人必须以蒋为中心,服从他,服务于他。一旦中共党人要以党军体制及其政治工作牵制蒋、束缚蒋,双方的合作就会遭遇麻烦。因中共党人是体制的主要实践者,国共关系从舒缓到紧张,就会给党军体制的发展带来巨大的不测因素。

二、思想歧见与体制变数陡生

意识形态是党军体制的重要凝合剂。思想不统一,信仰则相歧。信仰歧见,军队则难以合一。官兵有贰心,不仅党军体制绩效受损,军事指挥权也会遭遇多种挑战。军校及其教导团都以青年或年轻人为主体,思想尤为活跃。在理论体系异常完善的马列主义面前,三民主义的理论魅力是相形见绌的,这使党军体制的演变充满着变数。

军校开办初期,因有个别学生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迷惑而离校,1924年7月30日,蒋“对军校第一期学生讲明党员对于三民主义不能再有怀疑与批评的态度”^[3]。但是,进入黄埔的学生大多是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青年人。许多学生不会因为蒋的反对而放弃接受新鲜事物。受时局作用,青年学生在思想上更多地表现出尊西崇新的心态^[4]。孙中山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话语,既是为国共合作寻找理论支撑,也是为迎合激进青年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以便将这些青年人对社会主义的崇拜,吸引和转移到对三民主义的信仰上来。黄埔一期学生有数十人在进校前即加入了共产党^[5]。

[1]《我的回忆》第1册,第366页。

[2]孙中山死了以后,蒋介石在潮州宴请东征军上尉以上的军官。他在宴会上说:“反革命的势力虽然很大,但是我们国共两党的合作,有全国民众的支持,总理死了,还有鲍顾问领导我们,总理的精神不死!”转引《包惠僧回忆录》,第171页。

[3]《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20页。

[4]袁同畴:《一封谈论恋爱问题的信》,《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6年12月5日。

[5]关于第一期学生中,中共党员人数的说法多有出入。张国焘、徐向前、聂荣臻等人的回忆数字各不相同,周恩来年谱中的记述也与回忆文字有出入,具体人数从25人-80余人不等。

在意识形态上,军校建校之初要求学生绝对信仰三民主义,不允许异端存在。但在课程安排上,主要进行三民主义教育,也灌输一些马列主义思想。有关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使本来就信仰模糊的青年更莫衷一是。郑洞国回忆:“我本人的思想当时还算是比较进步的,但仍有很大的局限。譬如我对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异同就搞不清楚。”^[1]国民党虽一再强调笃信三民主义,但因各种因素的综合,始终存在着由于信仰不同而引发矛盾的危机。不过,直至1925年2月第一次东征结束,黄埔军校内具有国民党和共产党身份的同学之间,尚能融洽相处,党军体制因而可以正常推展^[2]。这一局面,很快因1925年3月孙中山的离世而打破平衡。

孙中山在世时,他既是三民主义的创立者,又是两党合作的仲裁员,也是党军体制的监护人。尽管中共党人不认同三民主义,对孙也缺乏骨子里的尊重,但面子上两党在军校及其教导团的合作,大体比较顺畅。孙逝世后,中共党人以宣传马克思列宁等国际共运领袖,来抵消孙的个人形象。这一现象流传开来,很容易动摇官兵对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的信仰,影响党军体制及军队的走向,并使国共关系趋向紧张。《国军政工史稿》对孙逝世曾有如下评语:“国父……在北京逝世,使黄埔官生顿失导师。……对军校之政治训练,影响尤大。一则国父在世,无人敢以谬论邪说,曲解三民主义及国民革命。国父即歿,共党分子即肆无忌惮,信口雌黄,以阶级斗争混淆国民革命,以共产主义混淆民生主义,且即从渗入军校政工,转变政治训练之目标与内容入手。”^[3]这一评价看到了孙中山离世对黄埔军校及其教导团党军体制带来的严重后果,但评论没有检讨国民党对党军体制及其政治工作的多重误区,而把一切归咎于中共党人背后使坏,因而论断比较牵强无力。

国民党一些有识青年注意到该党的理论困境,担心会导致中共对国民党言论的控制,从而影响军校、军队和政局的走向。这些人上书国民党中央,建议推选第一流理论人才,主持报刊,为党喉舌,做党员思想行动的指针:“本党建党以来,非不重视思想理论、组织宣传,也不是没有研究探讨,讲求方法效果,但重视得不够,研究讲求得不够,我们是不能否认的。本党革命初期,中山先生本身是有思想创见的人,许多先进同志如邹容、宋教仁、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皆借言论鼓吹革命,其效果非不宏伟,但长于思想理论文字的同志,每不能长期专心为党宣传研究,党为培植此项思想理论人才的努力,亦做得非常不够。自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党的宣传言论机构,半为共党所把持操纵,只有戴季陶先生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出,才成了暮鼓晨钟。”^[4]其实,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人在意识形态的调控方面,还是有所行动的。1925年5月23日,邵元冲发文要求认清孙中山思想系统,接受其思想和学说的全部,强调孙是中国道德文化集大成者^[5]。同日,孙文主义丛书先期推出孙文主义讨论集、孙中山先生文集、孙中山先生轶事、孙文主义概论、各派社会主义与中国^[6]。

但在黄埔军校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出版的《中国军人》上,对孙中山的评价很快发生了变化。1925年4月2日,《中国军人》第4期出版“中山专号”纪念文字。《从唯物史观所见之中山先生死的问题》一文明显与孙的唯生史观相龃龉^[7],引起国民党部分高层人物的警惕。8月17日,《中国军人》第6期刊登洪筠的《五月纪念周中不可忘记之三大伟人——马克思、列宁、孙中山》,洪文把马、列摆在孙之

[1]《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北京〕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

[2]郑洞国等:《杜聿明将军》,〔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3]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国军政工史稿》,〔台北〕“国防部总政治部”,1960年,第100页。

[4]《肖赞育先生访问纪录》,〔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

[5]元冲:《我们要做纯粹的孙文主义的信徒》,《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23日。

[6]《孙文主义丛书出版》,《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23日。

[7]《从唯物史观所见之中山先生死的问题》,《中国军人》第4期,1925年4月2日出版,第13-17页。

前,宣扬马克思发明社会革命的学理,孙中山发明民族革命的学理,列宁将二者加以联结。洪文宣称:“第三国际是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而中国国民党则为中国革命之参谋部。在世界革命之联合战线上,第三国际天然有指导中国革命的资格,而指挥中国民族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天然有受第三国际指挥的必要。”^[1]这段话白纸黑字地显示出中共初期“左”的幼稚认识。这自然与马克思宣传的工人无国界有关,但这种忽视民族意识的话语,很容易遭致国民党民族主义者的抨击。该期的《反共产与反革命》一文^[2],第7期蒋先云的《反共产?》一文^[3],举例商团倡乱、杨刘叛乱、暗杀廖仲恺等,把反共产与反革命划上了等号。

这些宣传推展开来,一易造成军校及其教导团官兵思想信仰的模糊,二易把军人用意识形态划分成彼此阵营,加剧军校及其教导团的不稳定因素。意识形态是党军体制及其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如果因意识形态引发军校及其教导团的裂痕,视军权如生命的蒋介石就会采取应对措施。如此一来,不仅国共关系由热转冷,党军体制也将遭到蒋的冷遇。

此前孙中山北上,一些国民党人扈从入京,不能兼任军校职务与课程。孙逝世后,这些人更无暇兼顾校务。再到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国民党高层对于黄埔军校政治教育的监管渐成摆设,共产主义在军校官兵中渐渐流传开来。1925年10月,汪精卫接任总党代表,鼓励全校官兵除研究三民主义外,应参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及党外出版物^[4]。汪的训令,实际使军校及第一军研读宣传共产主义成为合法行为,这进一步推动共产主义思想迅速流传。两种并不同质的意识形态共同在黄埔军校及其教导团传播,只会加剧官兵因信仰不同而导致的摩擦。这一摩擦的强弱,决定着蒋介石采取对策的力度,裁决着党军体制演变的轨迹。

蒋介石及国民党非常注意青年军人的政治教育,与此相同,中共也极其在意引领青年军人。青年军人联合会(下文简称青军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先后成立,即是两党都注重以主义为纽带,扩展党派力量的应对产物。青军会初期只是在军校公开活动的群众性组织,两党都有学生加入,党派色彩并不明朗,国民党员贺衷寒等人在青军会初期一样比较活跃。从《中国军人》创刊号上刊载贺的《青年军人与军阀》来看^[5],国民党年轻党员对反帝反封建的认识,与共产党人无异。两者的差距在于国民革命由谁来领导,国民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三民主义还是马列主义。国民党对于该组织寄予很大希望,力图把全国军人统合在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的旗帜之下。苏俄顾问和中共党人冀望以青军会为外围组织,广泛在军人中培植力量,最终为社会革命服务。《中国军人》创刊号首页语录——“全中国革命军人联合起来!”,就是对马克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套用,透露出中共团结全国军人的远大抱负。青军会成立后,中共党员比重越来越大,该会刊物《中国军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大量刊载共产党人文章,蒋先云等人甚至在军校内部公开散发《向导》周报和其它宣传共产主义的刊物,直接与三民主义的传输产生冲突,青军会已经被普遍认为是发展中共组织的据点。

中共组织迅速发展,令许多国民党人极为担心,王柏龄的回忆反映了当时若干国民党军事人物的担忧:“共产运动,也深入了各个阶层,他们把持了党部的一部分,紧握新闻舆论机关。……年轻人认识不清,意志不定的,很大竟加入了他们的秘密组织,在我们各级组织中,发生其党团作用,弄得鱼目

[1]洪筠:《五月纪念周中不可忘记之三大伟人——马克思、列宁、孙中山》,《中国军人》第6期,1925年8月17日出版,第2-3页。

[2]《反共产与反革命》,《中国军人》第6期,第4-8页。

[3]湘耘:《反共产?》,《中国军人》第7期,1925年9月2日出版,第12-19页。

[4]《汪党代表训令》,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辑:《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7册,1936年版,第249-250页。

[5]衷寒:《青年军人与军阀》,《中国军人》创刊号,1925年2月20日,第30页。

混珠,简直似乎在为他们作嫁。……上级同志,因为总理定的策略,不能不给面子与中共同志,其内心实在忧虑得很。……有时共产党人也显点小神通,如向高级同志保荐啦,讲人情啦,倒是一说一个准。……投机的,以前反帝共产主义的,现在都变成马克思信徒了。……就是以研究孙文主义为目的,来组织一个学会,既不是反对共产党,而又是研究我们的孙文主义。……于是由贺衷寒、潘佑强等去向廖党代表说明。……廖党代表一听,不禁手舞足蹈起来,笑着说:‘我正焦虑了许久,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居然被你们想着了。好!好!就这样子进行罢,我为你们的后盾。’(疑心廖先生卖党者请注意!)”^[1]1925年4月24日,在贺衷寒、缪斌等人的组织倡议下,黄埔军校中山学会改组为孙文主义学会。

如勒庞所言,相互对立的信仰之间几乎无法实现宽容;不同信念之间的冲突引发了可怕的暴力和殊死的斗争^[2]。以两会成立为标志,军校分裂的序幕就此揭开,两派之间的斗争骤然升级。群众性的打斗与论争,不时在学生宿舍、课堂、饭堂和社会公共场所爆发起来。两个组织各自办有刊物,除了写文章和口头辩论之外,还发生过多起磨擦和纠纷。蒋先云和贺衷寒等人几乎是开口就骂,张手就打^[3]。除了双方肉体冲撞,在信仰领域,两党的较量也间接以青军会与孙文学会为主要斗争阵地。孙文学会的理论来源主要是戴季陶的若干论著。周恩来亲自指导青军会,设计一副漫画:戴季陶身穿长袍马褂,十分吃力地背着一尊孙中山的塑像,朝着阴森破败的孔庙里走,旁边站着的洋人、军阀、党棍、财主等,拍手称快^[4]。

尽管中共采取漫画斗争形式,但这种偏重感性而学理不足的漫画对孙文学会构不成大的威胁。1926年,茅盾从陈延年那里知道,戴季陶写的几本册子在国民党员中影响极大。1925年7月8日,戴季陶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公开出版。戴重申孙中山关于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观点后说:“共产是要共有,不是要共无,是要共富,不是要共贫”,说孙中山是“从人类生存的出发点,去纠正那些以阶级斗争为历史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绝对的手段之社会革命思想”。戴季陶称中共参加国民党实行的是寄生政策,认为中共和莫斯科的理论在于“用揠苗助长的政策,阻止中国民族生机”。戴的理论给孙文学会“极大鼓舞”,有人认为“武装了他们的思想”。邵元冲“为戴氏理论做鼓桴之应”,许崇智甚至把该书“印发粤军全体官兵阅读”,蒋介石则对黄埔学员“殷殷训释三民主义以民生意义,应始终立于本党革命之地位”^[5]。针对这种情况,瞿秋白写作《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专门批判戴,然而戴的论著还是影响很大^[6]。

1925年6月平定杨希闵和刘震寰以后,广州革命空气浓厚,军队设政治机关和开展政治工作得到了认可。国民党中央决定在革命军中“一律设党代表,以谋军政的统一。这样,政治工作又转入了一新的时期,由创始而进至扩大了”^[7]。1925年8月1日,各军改用国民革命军旗号,由黄埔军校教导团发展而来的党军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倘能依照相关条文贯彻下去,党军体制或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但是,除了国民党内层出不穷的权力之争外,国共关系的齟齬同样呈现渐烈之相。两党的较量在许多场合已呈尖锐化,此前以青军会和孙文学会为前站的争斗形式,不久就让位于两党高层之间

[1]《黄埔开创之回忆》,第59-60页。

[2][法]勒庞:《革命心理学》,佟德志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3]《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4]王逸常:《周恩来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长江日报》,1980年1月6日。

[5]李云汉:《孙文主义学会与早期反共运动》,《中国国民党党史论文选集》第4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295-301页。

[6]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297页。

[7]贺衷寒:《军队政治工作的回顾与展望》(1932年12月在汉口对各师政训处长训话),《一得集》上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38年,第34页。

的直接交手。除去意识形态的纷争,对军权、政权的掌控越来越成为两党拼争的核心内容。“个人之间的宽容虽然困难重重,但毕竟是可能的,而集体之间的宽容根本就不可能。”^[1]

国共之间,随着矛盾冲突升级,裂痕越来越大。黄埔军校与第一军既是党军体制的先行者,又是国共合作的重镇。国共关系趋紧,令蒋越来越难以坐视不管。但因陈炯明依然是广东革命政权眼前的威胁,时局不允许国共敌对。即使平定广东,国民党政权还要直面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三大军阀势力。蒋介石北伐要成就大业,不能不继续依靠苏俄顾问与中共党人。蒋思前虑后,决意先局部调整党军体制,让暴露身份的中共党人另谋他处。中共党人主要在军校与第一军的党军系统从事政治工作,蒋这一“送客”之道,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冲击党军体制。如果接替中共党人出任政治工作的国民党员对党军系统不起兴趣,体制的前途就会堪忧。

三、“送客”与蒋介石局部调整党军体制

蒋介石心里异常清楚:国共纷争,轻则给军校与第一军政治工作带来消极作用,重则影响军事斗争的成败,不能不谨慎行事。直至1925年底,蒋都希望尽量弥合两党裂痕。在如何解释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问题上,蒋一直承袭孙的理论。比如1925年4月9日,蒋对第三期入伍生讲党员与主义的关系,重申“三民主义包括一切社会主义”^[2]。在平定滇桂军之后,陈炯明的势力依然较强,对于国共来说,都没到分手的时机,合作仍是压倒一切的必然选择,党军体制在平稳中前行。

为协调国共关系,1925年9月19日,蒋介石呈请任命周恩来为第一军政治部主任。这既是对周能力的认可,也不排除有把周收为己用之意,并借周之力使军校和第一军的共产党人为己服务。面对蒋的“善意”,中共支持蒋为孙的继承人:“我们有的同志在党军、东征军、黄埔军校内有意与无意之间就喊出了蒋校长是孙总理的继承人的口号。一直到1926年3月20日事变,仍然把蒋介石认为是一个左派,至少也认为他是可与为善的人。”^[3]

1925年底,陈炯明势力被粉碎,两党共同敌人基本肃清,双方对军权与政权的争夺渐趋尖锐。12月3日下午,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李公侠与10余名学生一起向蒋介石报告:“共产势张,四围都非同志。”蒋以带兵官不能干涉政治人员,以后一定严办的口头话语搪塞了李公侠等人的起诉。“近日非共产与共产之讧,愈演愈烈,公谓此足使本校本军内部分裂,党祸急矣,可奈何!”蒋清楚两党内讧极易使军校与第一军分裂。但到底如何处理,蒋此时并无较为可行的方案。5日,蒋再劝两党学生精诚团结:“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也。……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者也。”8日,蒋召集政治部职员与党代表讨论决定:校内准共产党员活动,凡有一切动作,均应公开。蒋令政治工作人员讨论两党纠纷,说明党军体制与国共关系密切交织。

直到此时,蒋对国共关系依然投鼠忌器,担心苏俄问罪自己。蒋是明智的,还在1925年上半年孙文学会孕育时,学会章程草稿第10条即引起苏俄代表的强烈抗议:“近来本党同志往往站在第三者的地位,来批评本党或攻击本党,甚而将非本党主义大为宣传,殊属有违纪律,我们认为这是危及中山主义和自己的不忠实的道德的。”^[4]加伦亲自与廖仲恺谈话,表示对这种攻击中共党人的做法不能接受,

[1]《革命心理学》,第18页。

[2]《蒋介石年谱初稿》,第339-340页。

[3]《包惠僧回忆录》,第172页。

[4]加伦:《广东军事动态概况》(1924年12月至1925年7月),《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关于黄埔军校的文献》,见广州近代史博物馆等编:《国民革命与黄埔军校——纪念黄埔军校80周年学术论文集·附录》,〔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6页。

结果该条款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删除。苏俄此举无异敲山震虎,加伦等顾问对蒋一刻也没有放松警惕:“都同意不能让他拥有超过三个师的兵力,同时,还要推出其它政治上可靠的革命将领与他并驾齐驱。”^[1]正因为回击苏俄顾问和中共党人的佳机未到,蒋依旧表现得低调温顺。12月11日晚,蒋在总指挥部宴请中俄人员,演讲革命应由莫斯科统一指挥^[2]。

1925年结束,随着蒋介石战功与地位的上升,其与总党代表汪精卫的政治斗争有激化之势。汪因没有自己的军队,更多借助苏俄顾问、中共党人及党军体制,牵制包括蒋在内的军事将领。因此,党军体制的走势又与蒋汪权力的增减密切结合。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后,在西山会议派的鼓噪下,对苏俄、中共以及汪精卫系统怀有敌意的国民党人更形增多^[3]。以后的事实证明,这反而为蒋收束中共党人,调控党军体制找到了更多的支持声音。

中共政治工作人员的两种所为,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警惕和应对。其一是,以列宁压低孙中山。为削弱孙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形象,中共利用特别时日,大力宣扬国际共运的革命先驱。1919年1月15日是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死难日,1924年1月21日是列宁逝世日,中共宣布1月15日至21日为纪念周,这明显是对总理纪念周的模仿与抵消。在中共宣传文章中,列宁除了是俄共领袖,还被定位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福星和导师”^[4]。其二是以列宁主义置换三民主义。童炳荣《为李列纪念周告中国民众》一文,公开宣扬:“只有列宁主义才是我们自己解放的唯一武器,才是消灭帝国主义和一切被压迫阶级的唯一武器。”^[5]童文公开与国民党的宣传口径——三民主义是解救中国的根本凭借——唱对台戏。国共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碰撞,越来越激烈。

不仅媒体大张旗鼓地刊发对列宁等国际共运领袖的纪念文章,军事单位也大规模地开展纪念列宁活动。1月21日,黄埔军校高调举行列宁逝世两周年纪念大会。到会者除全体官长、学生第三团入伍生外,还有俄顾问加拿夫等同志,共1500余人。会议由邓演达主持,与会人员向列宁遗像行三鞠躬礼,默念三分钟,唱国民革命歌^[6]。黄埔开展纪念列宁活动,使得军校学生的信仰在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更为摇摆不定。黄埔军校和第一军是蒋介石安身立命的根本,目睹此情此景,蒋怎能默然处之?为消解列宁世界革命导师的形象,低调处理苏俄世界革命中心的论调,蒋时常在公开讲演中宣扬孙中山是世界革命的导师,国民革命是东方被压迫民族的经典革命模式。

意识形态的白热化,使得党江日益扩大。在蒋眼里,国共纷争再难以像以前一样低调处理,党军体制的调控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1926年2月初,鲍罗廷离开广州,苏俄顾问团由季山嘉负责,季山嘉与蒋很快闹僵。汪精卫、王懋功和季山嘉等搅在一起,使蒋感觉处境日危,加速其采取对策的步伐。2月26日,蒋夺王懋功师长职,并扣留王。27日,蒋往访汪,报告对季山嘉处置意见。这些动作连续得手,大大增强蒋的自信。他感慨道:“凡事皆有要着,要着一破,则一切纠纷不解自决。一月以来,心坎憧扰时自提防,至此略定,然亦险矣哉!”^[7]28日,蒋任命邵力子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是蒋对中共掌控党军系统加以调整的强烈暗示。

按照党治原则及党军体制,蒋受汪限制之处甚多,其他各级军事指挥人员受中共党籍政治工作人

[1]加伦:《广东军事动态概况(1924年12月至1925年7月)》,同上书,第501页。

[2]《蒋介石年谱初稿》,第457、463、466-471页。

[3]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第297页。

[4]《纪念列李之宣传大纲》,《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20日。

[5]童炳荣:《为李列纪念周告中国民众》,《广州民国日报·李列纪念特刊》,1926年1月21日。

[6]《黄埔军校纪念列宁》,《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25日。

[7]《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40页。

员的监督甚多。3月17日,黄埔传来“共产党策动海军局的中山舰密谋发动武装政变”的谣言。自国民党二大以后,广州市内谣言很多,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柏龄部队内也流传武装政变的谣言,人心越发不安^[1]。中共高层对谣言有所警觉,但手中没有军权,只能静观其变。20日,蒋介石宣布省城戒严,捕获李之龙及党代表等多名中共党员,派遣士兵监视苏俄顾问寓所。

恰在三二〇事件前后,斯大林令苏共中央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组团赶赴中国,处理若干重大问题^[2]。基于斯大林指示精神,为拉住蒋介石,3月24日,布勃诺夫决定对国民党军队的党军体制“进行某种刹车”：“避免军队集中管理(设司令部、后勤部和政治部)搞的太快。……我们应该在这里同意削弱政委的监督,也就是在国民军(应为国民革命军)中把政委作为国民党党代表保留下来,仅此而已。……要取消政委签署指挥官命令的权力。……上述这一措施不是别的,正是某种刹车。”^[3]布勃诺夫对政治部制和党代表制的整改要求,既是广泛听取多方意见的产物,也是出于红军政治工作的经验,还是与蒋等军事将领协商的结果^[4]。因布的特殊身份,其报告对中共党人的权威性不言而喻。

担心苏俄与中共借助党代表的法定权力控制第一军与黄埔军校,是蒋对党代表制最为担忧之处。党代表职权重,不仅有监督所属人事经费的权责,还有权监督同级主官,必要时可以作紧急措施,先处理再报上级^[5]。为了防御共产党人的发展,蒋提拔孙文主义学会的缪斌、张静愚、贺衷寒等任党代表。对于党代表制,蒋认为革命未成功以前不能取消,但党代表资格应有限制。凡跨党党员不宜任党代表职,且须限入党在若干年月以上者,方有任党代表资格。军队即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共产主义及无政府主义者应暂退出。蒋把政训部改组计划看作北伐出征军队的首要任务,决定根本改订政训部条例,更换主任人选;条例未修正以前,各军党代表应一律调回,加以训练,而留政治部人员在军中宣传三民主义^[6]。这是蒋决意调整党军体制的强硬表示。

此时蒋羽翼未丰,中共在其它军队中的政工人员不仅没有退出,反而工作更为积极。各部队长官无不清楚蒋的发迹路线,都知道结好苏俄可以得到更多武器装备,任用中共党员进入党军系统推动政治工作,可以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突飞猛进。第六军军长程潜甚至邀请退出第一军的中共党员全体加入,第二三军也在强化政治工作。蒋对党军体制全面加以调整的计划并未实现,这自然有苏俄的抵制,各军事长官对蒋的制衡也是重要因素。

斯大林“加强广州军队”的指示和布勃诺夫“刹车”党军体制的决定,让已经处于不利局势的鲍罗廷如此说道:“军队中军事政治工作的前景缩小了,有关的顾问的作用降低了。”^[7]1926年4月上旬,暴露身份的250多名中共党员撤出第一军及黄埔军校。周恩来也被迫辞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及政治部主任职务,5月初回到广州,担任政治训练部举办的特别政治训练班主任。该班学员多是三二〇事件后被迫离开黄埔和第一军的共产党籍政工人员,周将大部分结业学员派往第四军叶挺独立团^[8]。5月21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发布对时局宣言,决定北伐^[9]。共产国际远东局如此评论:“这次北伐使蒋介石

[1][5]《包惠僧回忆录》,第194-197页,第207-208页。

[2][俄]乌索夫:《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赖铭传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

[3]《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1926年3月24日于广州),《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169-170页。

[4]3月24日,蒋与布勃诺夫再次交流时局,“彼此皆以为知言”。见《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一》(1926年3月22、24日),《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

[6]《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54-558页。

[7]《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411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4-96页。

[9]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四卷1925-1927),[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458页。

石发动的政变以及作为这一政变内容的整个军事独裁倾向神圣化了。”^[1]

结 语

苏俄党军体制的特征,一是意识形态定于一尊——马列主义;二是在信仰专一的基础上,党组织有至上权威,党权高于军权。而在党军体制输出中国之前,苏俄对国民党的要求——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和接受中共党人,就已为党军体制引入中国之后,国共两党的既合作又纷争埋下了种子。国民党虽然进行了改组,但其党的活力很大程度上源自外力,即源自中共党人的积极进取。这一时期的中共党人,尽管在部队中多担任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等职务,惜其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运动军官的身上,没有面向底层士兵。这就意味着党军体制的人事结构、业务运行,均有不小的缺陷。

拓宽历史视野,对比一下苏俄红军和日后中共军队的党军体制,能够得出一个结论:要想使党军体制走上正轨、发挥威力,代表党的政委、政治部主任,需要整日和官兵接触,战场上成为官兵的表率。更重要的是,政委、政治部主任既要用人格力量感染官兵,更要用政治原则规范官兵。而要做到这些,党支部和各级党组织必须十分完善。党的中央委员会、部队各级政委和政治部主任、部队各级党组织、广大的军入党员,多位一体,才能达致党军体制的理想境界。

以此标准衡量1924—1926年北伐前的党军体制,军校和第一军虽然建立起了特别区党部,但党部的职权不够。且自军校开学,国民党即采取轻率的集体入党的形式^[2]。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和入党的神圣性无从发挥,入党几近儿戏。两党意识形态的不同,又使党员之间容易出现嫌隙。国民党组织的权威性和神圣性,更难以建构起来。党权的散漫,使得党军体制最重要的基础和屏障为之缺失。

三二〇事件是对国共关系和党代表制的强力冲击。“二十一那天整天往返磋商善后的细目。我因为自己也有自己的事,例如党代表是归我管辖的,经这次事变,这种制度就根本发生问题。”^[3]事件后,蒋在军校和第一军中排斥共产党员,削弱党代表制度。蒋调邓演达兼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把该军中共政工人员全部撤换。“中山舰事件后,虽然仍保留了政治部,但由于排斥了共产党人,政工威力远非昔比。”^[4]蒋的人事调整固然阻遏了中共对第一军及黄埔军校的掌控,军权稳定了下来,但政治工作因此大受影响。继中共党人而来的国民党人对军中政治工作敷衍塞责,工作流于形式。第一军军纪开始滑坡,部队战斗力迅即下降,党军体制的活力为之变弱。

在准备北伐期间,蒋继续巩固自己的地位。1926年6月5日,他出任总司令。7月5日,蒋就任军事总监,并于次日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第2天,国民政府发布总司令办公室组织方案,详细说明了蒋的权限:一切军政方针都由总司令直接掌握。蒋以手中掌握的军事力量,成了国民党政权合法的,同时也是事实上的权力中心。在阻止了中共党籍政工人员的牵制后,以党领军的建军目标,调头朝着以军控党的方向扬长而去。

〔责任编辑:肖 波〕

[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报告》(1926年9月12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439页。

[2]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7—28页。

[3]陈公博:《苦笑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4]《李宗仁回忆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